

叶洪添

鄧演達研究

葉選平題



教育出版社

邓演达研究

叶洪添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 09 号

邓 演 达 研 究

叶洪添 著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惠阳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8 插页 185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61-1220-3/K·45

印数:1—5000 定价:7.00 元



革命之性根

養成樂死之志氣

1923 年孙中山先生亲笔题赠邓演达的照片和对联。



1926 年 7 月北伐途中，邓演达(前中)与郭沫若(前右)、铁罗尼(前左)等在广东韶关曲江河畔待渡。

目 录

大胆的探索 丰硕的成果

——《邓演达研究》序言 萧耀堂

前 言

评邓演达先生.....	(1)
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策略	(15)
邓演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贡献	(28)
邓演达与第三党	(42)
邓演达“平民革命”思想的产生	(60)
邓演达“平民革命”纲领的主要内容	(73)
试评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纲领	(88)
邓演达联共思想的演变.....	(105)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仍是国民党左派、中国共 产党的亲密朋友.....	(123)
邓演达与第三党的“社会主义”思想.....	(136)
邓演达的人权思想浅析.....	(149)
怀念邓演达 学习邓演达.....	(164)
邓演达年谱.....	(175)
附录一：周恩来、宋庆龄、郭沫若论邓演达	(193)
周恩来论邓演达.....	(193)
纪念邓演达.....	宋庆龄(195)
纪念邓择生先生.....	郭沫若(197)

评邓演达先生

邓演达先生是国民党左派、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战士、著名的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在民主革命中立下的功绩，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称颂。

邓演达先生离开人间已有半个多世纪，祖国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今天我们学习、宣扬邓演达先生，对于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发扬他的革命精神，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激励我们投入改革开放的洪流，实现四个现代化，振兴中华，以及促进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早日统一，都是极为有益的。

本文是此书的首篇，对邓演达先生的思想和革命业绩作简要的、概括的叙述，让读者对邓演达先生有一个粗略的了解，故标题为《评邓演达先生》。笔者认为，对包括邓演达先生在内的所有历史人物作一个公正的评价，都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的思想总是十分复杂的，而且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我认为，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全是优点或成绩是不可能的；同样，全都是缺点或错误也是不存在的。只有把历史人物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看他一生中的主流并用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和分析问题，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在评价邓演达先生时，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呢？这是本文乃至全书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从邓演达先生是国民党左派这个出发点去评价他，而不能从其他的出发点去评价他，更不能以中共领袖人物或共产党员的要求去苛求于他，这才

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那么，何谓国民党左派呢？早在1924年4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刊物《向导》上发表文章指出，由于“观念与思想出发点的不同”，国民党内必然会分化成左、中、右三派。左派是要“忠诚地贯彻国民主义”，对任何列强和军阀，主张以群众的反抗为目的，而不与其妥协；而右派则急于党的胜利，甚至于个人地位的成功，“主张对列强和军阀的妥协下，靠少数人的武力与权谋，获得若干政权。”故“采用革命方法的是左派，采用妥协方法的是右派。”^①尽管当时陈独秀对国民党左派、右派还没有能作更确切的表述，但毕竟该文是我们党内第一篇给国民党左派下定义的文章。此后，在1925年5月，蔡和森在《向导》上又发表文章，他明确提出了国民党左派应当具备的四个条件：一是彻底地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封建军阀及买办阶级；二是恪守孙中山先生引导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苏俄携手的方针；三是与一切反革命右派分子决绝；四是遵守保护工农群众利益之政纲。^②显而易见，蔡和森的论述比陈独秀具体、全面。尽管国民党左派队伍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但蔡和森所讲的四个条件仍是符合变化了的国民党左派的状况的。

今天，我们纵观国民党左派发展的历史，还可以在蔡和森提出的国民党左派的标准的基础上下个更确切的定义。在这里，我同意莫志斌同志的看法，作为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应该做到：第一，旗帜鲜明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忠实地奉行国民党‘一大’宣言，努力实践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三，坚持爱国民主的立场，与危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作不可调和的斗争；第四，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③在这里，笔者之所以用一定的篇幅叙述国民党左派的定义、标准问题，目的在于力求更客观、更准确地评价邓演达先生。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就邓演达先生的思想和革命的一生

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一生壮节炳千秋”^①

邓演达，字择生，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人（今属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1895年3月1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的一生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独裁政权的一生。他的一生正如人们歌颂的那样“一生壮节炳千秋”。邓演达从14岁参加同盟会起至36岁不幸牺牲，二十二个春秋经历了艰苦而光荣的革命历程，跨越了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实践，对我国革命的理论 and 道路作了很有见地的探索。

邓演达青少年时代度过10年军校生活，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陆军速成中学、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受到了系统的军事教育。他在军校学习军事科学的同时，“又努力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学识有较广阔的发展”^②。

1919年邓演达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往边防军入伍见习。1920年孙中山命邓铿（邓仲元）创建粤军第一师，邓演达被任命为该师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从此他成为孙中山先生的积极追随者。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他奉令联络第一师的其他各部，东下讨陈，并自任前锋，重新占领广州。他1923年春任团长时，参加了攻打沈鸿英、陈炯明的战斗，因战功卓著，被孙中山提拔为少将参军，并赠给他半身照片一帧和书赠对联一副，联曰：“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孙还赞誉地说：“有两达（指邓演达，张民达），革命有希望。”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邓演达拥护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所部第三团首先接受新的政治训练，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他先后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他注重革命教育和政治、军

事训练,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深受师生爱戴,为黄埔革命力量的团结、发展作出了贡献。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北伐途中,他不畏艰险,除积极做好政治工作外,还与苏联顾问铁罗尼一道始终在前线督战。攻打武昌城时,他的坐骑被敌击毙,仍沉着指挥,终于夺取了武昌城。嗣后,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后,他又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等职,是杰出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者。

1927年2月邓演达同徐谦、吴玉章等五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与蒋介石进行斗争。3月7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免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委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等职,邓演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并重新任命为军委会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建议下,中央成立了土地问题委员会,并与毛泽东一起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开展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研究,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下令通缉邓演达。他鉴于形势逆转,不久随即辞职离汉,赴欧、亚十几个国家考察研究,以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到达苏联时,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三民主义的真理,提出了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主张,与新旧军阀决裂并作殊死的斗争,充分表现了他在反革命逆流中忠勇奋发,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召集各地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部会,他被

推选为总干事。他以复兴中国革命，继承孙中山先生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为职志。所有这一切，为蒋介石所不容。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他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而壮烈牺牲，时年仅36岁。

二、“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

宋庆龄在《纪念邓演达》中说：“邓演达同志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的对之不屑一顾。”^⑥她谓邓演达是“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至少有两点充足的理由：一是他“坚定忠实”。就是坚定地主张国共合作，贯彻执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坚定地与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二是他“绝不妥协”。就是他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反动行为，进行了坚定不移的斗争；他从不为反动派的物欲和高官厚禄所动摇。他为追随总理的步伐“准备牺牲生命以赴”^⑦，从不妥协投降。具体来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

邓演达一生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14岁就秘密加入同盟会，接着参加辛亥革命并先后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和广西军阀沈鸿英，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在国民革命时期，他竭诚拥护国共两党合作，致力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创办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北伐，消灭吴佩孚等军阀势力立下汗马功劳。与此同时，同背叛国共合作、搞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汪精卫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国民革命失败后，他继续为完成孙中山未完成的革命事业而艰苦卓绝、忠勇奋发、斗争到底。他从另组新的政党到最后牺牲，同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叛逆行为的斗争，同国

民党独裁政府的反动统治的斗争从未间断过。

邓演达一生致力于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他的理论具有旗帜鲜明、见解独特和剖析深邃的特点。他不但继承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他曾明确地指出：“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完全符合革命的需要，任何个人、任何阶级违反这一原则，都是离开革命阵线，成为革命的对象。”^⑧他在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同时，并不停留在孙中山的施政方针的注解上面。他根据三十年代世界形势的变化、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权性质的变化及工农大众切身利益的要求，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提出了民族的平民革命的纲领，这就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新三民主义，为他建立新的政党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是关于民族主义。邓演达关于民族问题的原则与孙中山所阐述的原则是一致的。对外，要求中华民族独立；对内，要求各民族平等。但邓演达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对外政策方面提出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英、美、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不平衡，所以对于中国它们之间有一致之处和矛盾之处，我们要注意斗争策略。第二种是社会主义苏联。它在“客观上可以做我们的朋友”^⑨，但对外又推行“一种自己本位的策略”^⑩即利己主义政策。第三种是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它们有共同的利益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因此，“被压迫民族们——是我们真实的朋友”^⑪。基于上述分析，他认为对外政策应遵守：（1）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2）同苏联恢复邦交，建立友好和合作关系；（3）与各弱小民族结成亲密的关系，建立反帝国主义的联盟。这样，在国际范围内正确地地区分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划清了敌人与朋友的界线，明确了斗争的对象与联合的力量。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他提出了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盟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是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

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¹⁹但是,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已背叛了孙中山的新民权主义,用专制的所谓“训政”代替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国的政权依然为“少数者所得而私”。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邓演达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民权主义思想。他认为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平民政权。所谓平民政权,就是被南京政府压迫的、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平民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这些平民群众,是劳动者,即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以及计设生产、管理生产、担任运输分配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等等。这个政权的性质就是“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²⁰。“所谓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²¹。故平民政权亦称农工民主政权。民族的平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²²。就是说,要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官僚的专制统治制度。建立平民政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无剥削的、民主的、土地国有的、产业社会化的、生产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中国社会历史前程的革命,“是一个复杂性的一种革命,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²³。邓演达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邓演达,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

三是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曾提出过“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新民生主义的纲领。邓演达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构架,扬弃了某些主张而增添了许多他认为所能容纳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的民生主义思想。

第一,关于工业近代化问题。他认为必须发展民族自主经济。这是邓演达平民政权的基本经济政策。其内容包括:取消帝国主义

在华的一切经济特权；彻底肃清经济领域的封建残余，取缔掠夺农民的封建主义手段；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允许私人工商业有限的存在，但不允许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必须运用政权力量，将一切大产业，关键产业及独占性产业由国家经营。这是邓演达对孙中山新民生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第二，关于农民的土地问题。封建的土地制度，是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邓演达认为，要完成民主革命，铲除封建经济基础，根本的就是要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一定要有广大农民参加，而解决土地问题乃是农民参加革命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农民问题解决了，便解决了中国问题的80%。“只有农民起来，才能把封建的根基摧毁”，“只有农民起来，才能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剥削基础打破”^⑤。因而，他尖锐地指出：“农民是我们的量尺”，赞成农民运动的，“便是革命的朋友，自己觉悟起来，参加这个工作者，便是中国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反对这个工作的，便是反革命”^⑥。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呢？邓演达认为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实行“耕者有其田”，但这只是一种过渡的办法；第二步，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实行土地国有，亦即土地社会化。为实现这两个步骤创造条件，他规定了过渡时期具体的农业政策。这些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否定封建主义土地制度，扫除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也发展了孙中山关于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思想。

邓演达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和继承者。他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大大超过了二三十年代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水平，把革命民主派的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对于后来在中国出现的各爱国政治思想和主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胡耀邦同志在 198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邓演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

从筹备北伐到国民革命失败前夕，邓演达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他认为，要贯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执行三大政策，关键是坚持国共合作。国共合作，是孙中山亲手建立的，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就要同共产党合作。北伐时，他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特别重视任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担任总政治部各部门的领导工作，作为北伐军的骨干力量，以抵制蒋介石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妄图独揽大权的阴谋。例如，恽代英曾任秘书长；孙炳文先后任秘书处长、后方留守处主任；周逸群任宣传大队副队长；郭沫若先后任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各军中的党代表和总政治部负责人，大部分也是共产党人担任，如林伯渠、李富春、朱克清、廖乾五、黄日葵、彭泽湘等。还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派到各师团营连负责政治工作。在总政治部及在各师团、营、连工作的共产党员共有二三百人。由于精诚团结，从来没有磨擦。他主持的总政治部成为当时国共合作的典范。

在大革命后期，邓演达兼任中央农民部长时，虚心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积极支持开展农民运动。为培养大批的农运干部，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武昌开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具体领导与支持毛泽东在该所开展各项工作；他主持的农民问题讨论会，聘任毛泽东、恽代英、李达为委员；他主持的土地委员会，邀请毛泽东、谭平山等人共同拟草一系列文件。邓演达十分重视农民和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认为，农民解放的关键，在于解决土地问题。他说：“土地问题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实为革命生死问题”，“土地问题解决了，才算是农民问题解决了”^①。因此，积极支持发动农民，摧毁农村的封建势力，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使乡村政权掌握在农民手中，并以武装农民保卫农民政权，造成新的社会秩序，铲除封建经济统治的基础。他这些正确的观点和主

张，不只是在当时的国民党中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共产党内，达到这种认识高度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可见，在领导农运方面，他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保持了一致的立场。因此，毛泽东说：“大革命时代作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同我合作。”²⁰

邓演达在武汉国民政府工作时，在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提高党权运动，东征讨蒋及反对蒋介石叛变的一系列斗争中，都与共产党人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等观点一致，并肩战斗。在汪精卫等积极准备反共时，邓演达多次找汪精卫谈话，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分裂。以上的事实说明，邓演达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不猜疑不疏远，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周恩来在评价邓演达时说：他“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²¹

（三）他是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坚强战士。

邓演达捍卫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过程，也是他与破坏国共合作、背叛新三民主义的行为进行斗争的过程。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这个时候，敢不敢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成为区分真假革命或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岁月里，邓演达没有因革命失败而气馁，也没有因反革命的猖獗而动摇，而是继续坚持革命。宋庆龄曾赞扬邓演达说：“当时所有忠实的革命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敢，不为任何外力所屈……。”²²

事实正是如此。邓演达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反人民的叛变革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则要求迁都南昌，以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实行独裁统治。1927年1月26日，邓演达亲自到庐山劝说被蒋扣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来汉并指责蒋介石公然违抗中央决定的分裂行为。当蒋介石提出苏联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

他，要把鲍驱逐出境时，邓坚决反对。邓演达的话蒋介石听不进去，邓极为气愤，次日回到武汉，从此与蒋决裂。在这场斗争中，邓演达成为当时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实际领导者。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4月22日，邓演达和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4月25日，邓演达主持了在武汉举行的二十余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谴责蒋介石政变、残杀工农群众的罪恶活动。当汪精卫准备叛变时，邓演达多次与之斗争。当他感到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自己必须和汪划清界线时，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告别书，严厉谴责汪精卫的反革命叛变行径。

1927年8月15日，邓演达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他与宋庆龄、陈友仁于11月1日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言》指出：蒋、汪之流已经成了“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930年8月，邓演达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发表了《政治主张》，出版了《革命行动》刊物，明确宣布“行委”要为复兴国民革命，推翻南京国民党新军阀，建立平民政权而斗争。为此，他于1931年夏制定了武装反蒋起义的军事计划。然而，由于叛徒的告密，军事行动计划尚未实施，邓演达就被杀害了。周恩来高度评价邓演达的反蒋斗争精神说：“这人的品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²⁹

（四）他是威武不屈、血洒金陵的革命英烈。

邓演达的武装反蒋的起义计划，对国民党是个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决心除掉他。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正在上海英租界愚园坊二十号给干训班学员讲课，因叛徒陈敬斋出卖，被蒋介石逮捕。

邓演达不怕牺牲、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当“行委”及“黄埔革命同学会”的同志得知蒋介石派王柏龄到上海，勾结租界当局，重金悬赏寻捕邓演达的消息时，都劝他速离上海，暂避一下。他深知处境危险，为了复兴革命工作，谢绝隐避。他被捕后，

蒋介石软硬兼施，要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并许以高官厚禄，拉拢、软化他。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都十分容易得到，但他却不屑一顾。蒋介石亲自派戴季陶做诱降工作。蒋提出，只要邓演达发表一个声明，取消“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就可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马上可以坐上高官厚禄的交椅。邓演达以“我要维护中华民族的正气”²⁸，严词拒绝了。邓演达在狱中，当有人问他，南京劝降怎么办，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让他拿刀来。”“我想我没有软化的必要，我仍当坚决的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我曾答复他们，这不是私人的争执，而是为社会为中国。”²⁹铁窗烈火使他锻炼得更为坚强，诱降和威逼丝毫未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蒋慑于他的威力和影响，终于在同年11月29日把他暗杀了。

三、邓演达阶级的和认识的局限性

邓演达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是有他阶级的和认识的局限性的。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曾发表过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言论。邓演达明确表示：“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³⁰他还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只能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而中国当今的社会尚处于半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没有产生的客观条件，而是第三国际培植的结果。他的主张是明确的，就是在中国，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不行的，必须打倒；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设新中国也是不可能的。他所持的观点，前者是正确的，而后者是错误的。因而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建立平民政权，即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执政党。正因为如此，他虽然一再表明自己是代表农工利益的，他的纲领、宣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工的利益，但在实践上则脱离了工农群众，所以也不可能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这样，